

日本研究丛书

日本经济与 中日经济关系研究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

魏全平 •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丛 书 序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战后日本崛起于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研究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另外,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外学者智慧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和国际日本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于《日本研究丛书》首本付梓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及中外有关朋友,谨表示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郑励志

1991年11月

编者前言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1990年7月,至今已有20个年头。按日本的传统习惯,20周年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年,会举行成人节仪式。在日本研究中心“成人节”来临之际,我们特地出版纪念文集来庆贺这一节日。

20年前日本研究中心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摸索阶段。当时,中国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是那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课题。而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经历了战后40余年的经济发展,从战后的经济复苏到高速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大有超越美国之势。日本是战后经济发展的“优等生”,也是战后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领先于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先行者”。因此,研究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使之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自然成为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日本研究中心以日本经济研究为重点,同时涉及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中日关系,以此展开中日双方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

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年来,在努力提高自身研究水平的同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每年举办数次学术研讨会,前来参加会议和活动的来自海内外学界、政界和企业界的人士多达数千人次。日本研究中心出版了几十部学术著作,并与日本的20所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现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高校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研究机构之一。

这册为纪念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而发行的文集(经济部

分),主要由本中心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编辑而成,反映了日本研究中心这20年来在不同时期研究日本经济和中日经济关系的成果和水平。论文集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一、中日经济与东亚合作篇;二、金融与财政篇;三、贸易与投资篇;四、产业与经营管理篇。

在“中日经济与东亚合作篇”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经济关系》(郑励志)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论文从商品贸易、直接投资、政府与民间的融资和技术合作等四个方面,详尽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与中日经济关系》(郑励志)则强调了推动现代化建设与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文章主要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状况。《日本经济复苏和东亚合作》(樊勇明)主要探讨了21世纪初日本经历“失去的十年”后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特征,以及经济复苏对其东亚战略的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FTA战略比较》(魏全平)在回顾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展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中日FTA谈判难以展开的原因,并就中日缔结FTA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文献回顾与研究议程》(贺平)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探究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

在“金融与财政篇”中,《日本的金融体制及其改革》(陈建安)在论述战后日本金融体制的变迁以及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就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日本主银行制的兴与衰》(戴晓芙)剖析了日本主银行制度在其衰败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的条件与原因。《日本式金融体系的特征及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以主银行体系为核心》(戴晓芙)对以主银行体系为核心的日本金融体系的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从本币升值到流动性过剩和出口依赖——中日两国的区别在哪里?》(丁剑

平、潘橙璋)运用比较研究的手法,就中日两国的货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及其后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经济增长与利益格局调整——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托底政策”及其对中国民生建设的启示》(樊勇明)从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角度,研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民本思想以及实践,对中国目前的民生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试论中日两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魏全平)在探讨和分析日本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其改革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揭示了有助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有益启示。

在“贸易与投资篇”中,《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贺平、樊勇明)探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日美贸易摩擦推动下的日本国内改革,揭示了日本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摩擦——以中日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中心》(傅钧文)对80年代和90年代中日纺织品贸易摩擦的状况及其成因进行了有效的分析。而《日本对外投资的经验教训》(童适平)则以日本对外投资为主题,在综述日本对外投资发展过程及其经济背景的基础上,研究了日本对外投资对国际收支、汇率以及国内产业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探讨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震荡及其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日本启示录》(陈云)在对日本对外贸易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同时,对日本国际贸易中的汇率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产业与经营管理篇”中,《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企业的行为方式》(陈建安)主要从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企业行为方式间的关联性来考察日本政府和企业关系。《中日能源战略决策机制的比较研究》(张浩川)通过对中日两国能源战略的演变过程和能源决策机制的比较研究,研讨中国在能源战略制度、执行、监督以及考核等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日本农村工业的发展及启示》(焦必方)主要探究日本农村工业的发展模式和特点,以求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有所启示。《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及启示》(焦必方)在论述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对

规模化经营的背景、形式和特点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中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小型国际企业”带来的启示》(张浩川)主要分析日本“小型国际企业”的发展以及特点,探讨中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日本企业劳使协商制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傅钧文)主要从历史的脉络探讨日本劳使协商制度的起源、形成以及现行的实际运行模式。

最后,借纪念文集(经济部分)出版的机会,对长期从事日本经济和中日经济关系研究的三位前任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郑励志教授、陈建安教授和樊勇明教授,表示深深的敬意。日本研究中心现在的成就,与三位前辈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密不可分。同时,也对为本纪念文集(经济部分)提供论文的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本人水平有限,本纪念文集(经济部分)的不当之处,尚请各位专家及广大读者教正。

魏全平

2010年6月30日

目 录

中日经济与东亚合作篇

-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经济关系 郑励志 / 3
- 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与中日经济关系 郑励志 / 11
- 日本经济复苏和东亚合作 樊勇明 / 22
-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 FTA 战略比较 魏全平 / 37
-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
——文献回顾与研究议程 贺 平 / 49

金融与财政篇

- 日本的金融体制及其改革 陈建安 / 71
- 日本主银行制的兴与衰 戴晓芙 / 102
- 日本式金融体系的特征及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以主银行体系为核心 戴晓芙 / 114
- 从本币升值到流动性过剩和出口依赖
——中日两国的区别在哪里? 丁剑平 潘橙璋 / 134
- 经济增长与利益格局调整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托底政策”及其对中国
民生建设的启示 樊勇明 / 167

试论中日两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魏全平 / 190

贸易与投资篇

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 贺 平 樊勇明 / 209

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摩擦

——以中日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中心 傅钧文 / 223

日本对外投资的经验教训 童适平 / 238

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震荡及其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

——日本启示录 陈 云 / 245

产业与经营管理篇

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企业的行为方式 陈建安 / 281

中日能源战略决策机制的比较研究 张浩川 / 298

日本农村工业的发展及启示 焦必方 / 318

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及启示 焦必方 / 332

中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

——“小型国际企业”带来的启示 张浩川 / 344

日本企业劳使协商制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

启示 傅钧文 / 356

中日经济与东亚合作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 中日经济关系

郑励志

导 言

中国经济在最近十余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1981—1990)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按GNP计算)是9%。这几乎可说是与60年代的日本或其后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相匹配的。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了高速的增长。1991年的实际增长率是7%,估计今年的增长率会达到10%。因此,现在已经出现了90年代(1991—2000)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可能会达到9%的预测。与1953—1980年的28年间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按国民收入计算)约为6%相比,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得以增强,国民的生活得以改善,11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大致(95%以上)得到解决。这对中国而言可说是历史性的大事件。

带来这种经济建设成果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给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带来了显著的发展,从长期以来仅仅是商品贸易,发展到包括直接投资、政府与民间的融资、技术合作等在内的全面的合作关系。总之,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交流国;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日本重要的经济

伙伴。两国的经济交流今后将会日益密切。

一、改革开放的历程与现状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余年,备受世界瞩目。以尽可能快地提高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目标的中国政府于1978年末决定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政府制定了改革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将比较封闭的经济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并逐渐付诸实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广大的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自1984年开始,在城市以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领域内实施了企业改革和计划、价格、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并深入发展到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广泛的改革。总的看来,其结果是经济活动渐渐地从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分权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变,充满了活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首先是1980年8—10月在南方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成了经济特区,创建出口外向型产业,作为从外国或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后来又加上台湾地区)引入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的窗口。1983年,海南岛成为经济特区。之后的1984年5月,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成为对外开放城市。再之后的1988年3月,沿海开放区域扩大到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与福建省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带。此外,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环渤海地域的一部分被重新认定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年4月,随着海南岛升格为海南省,全省被指定为经济特区。进入1990年代以后,开始了世纪大开发。上海市浦东地区的开发与开放被指定为国家重点项目(1990年4月)。汕头、深圳、珠海特区的面积也被大大地扩大。至此,形成了自北面的渤海湾到南面的北部湾、绵延数千公里,包括许多大中城市、有近两亿人口居住的沿海地带对外开放前沿区域。以这个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为中

心,对国外资金以及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1979—1991年的13年间,中国大陆引进的外国及港、澳、台直接投资(包括对合资企业、合作企业、100%外资企业等所谓的“三资”企业的投资)是41 995件,合同外资额达522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集中在上述沿海地带。此外,在此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1991年的1 357亿美元,增加了五倍半。

今年以来,以邓小平对深圳、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视察(1992年1—2月)为契机,改革开放持续深入,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改革的面继续向更深、更广的目标推进。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机构转型(以形成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自主管理的独立企业为目标)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股份制实验正在稳步地扩大,计划、财政、金融、价格、流通体制及住宅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正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速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在加速进行。期待至20世纪末,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大致形成。

从开放的面来看,上述中国沿海开放地带正在逐渐从沿海向腹地延伸,在由线转为面的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为起点,经过武汉到重庆长达数千公里的长江沿岸一系列城市与区域相继开放,形成了新的开放带,正在与数千公里的沿海开放地带形成东西南北呈T字形的开放区域。长江流域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域之一,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其外部有始自黄海之滨的连云港、长达4 000公里的陇海铁路、兰新铁路,通过新疆的阿拉山火车站与独联体各国的铁路相连,经过东欧与荷兰的鹿特丹港相连接。沿着这条“欧亚大陆桥”地带的加速开放与经济发展也在积极的研究中。此外,全国内地各省、自治区也提供优惠政策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区域也开始零散地出现了许多开放开发点。此外,去年至今年间,同与中国国境相连接的周边国家举行边境贸易的通商地基本上全部被开放。我本人曾于今年1月和8月分别赴云南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边境贸易,现在边境贸易正处于快速的

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以“面”、“线”、“点”多维立体的方式在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展开。

改革的深化与对外开放的扩大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原来的预测,外资投资也在迅速地进入。今年 1—6 月间引进外资(直接投资)达到 13 000 件以上,合同外资投资金额达到 145 亿美元。当然,改革与开放政策在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其中大部分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可以慢慢地改善、克服。

二、近来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拥有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关系,进入近代以来,在经济层面拥有很强的互补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下,中日两国民间企业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展、维持了两国的经济关系。之后,由于 1972 年的两国邦交正常化与 1979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两国经济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从此前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包括投资、融资、技术合作、经营管理上的指导等在内的全面合作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日经济关系主要方面的大致轮廓。

(一) 贸易

1991 年的中日贸易总额是 203 亿美元,日本方面的通关统计则达到 228 亿美元,是 1972 年邦交正常化时的 10 亿美元的 20 倍,是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的 48 亿美元的 4 倍多。

日本很早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970 年代以来,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日本所占的市场比例处于第二位,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长期以来一直居于首位。1985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对日贸易所占的市场比例达到 30.4%,出口占 22.3%,进口

占 35.6%。同年,日本的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7.1%,中国成了继美国之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至 1980 年代后半期,由于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以及经济的调整,中日贸易,特别是从日本的进口有所缩小,而日本与韩国、德国等的贸易显著增加。1991 年日本的贸易总额中,日中贸易额退居第六位,特别是对华出口退居日本出口总额的第八位。但是,在日本的进口方面,则是从中国的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第二位。

如上所述,这二十几年以来中日贸易虽然大体上得以顺利发展,但问题还是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贸易的不平衡。1973—1988 年的 16 年间,中国的对日贸易除 1982 年 11 亿美元的出超外,每年都是入超。特别是 1984—1986 年的 3 年间,入超额总计达到 122 亿美元,大大超过了至今为止 12 年间的累积入超额 81 亿美元。形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同(中国对日出口的是原油之类附加价值低的传统商品,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全部都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工业制品);其次,中国商品欠缺竞争力;再次,日本对中国若干种类的产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

但是,自 1986 年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努力下,两国双边贸易出现了以下可喜的变化。首先,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85 年,中国对日出口额中制成品的比例仅占 27%,到 1990 年已经上升到 50.8%。这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从以前的“垂直分工”转向某种程度的“水平分工”。其次,与上面一点相关联的中日贸易的不平衡得到了改善。1989—1991 年间,中国的对日贸易出现了比较大的出超。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对日贸易的结构性入超才是两国贸易长期发展的趋势。

(二) 直接投资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即对所谓“三资”企业的投资)自 1984 年开始真正启动。截至 1991 年末,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三资”

企业合计 1 995 家,合同投资额(日本方面)41 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内地“三资”企业总数与合同外资总额的 4.8%与 7.9%左右,位居中国香港与美国之后的第三位。然而,实际投资额(1991 年末达到 29 亿美元,占当时外资实际投资额的 12.7%)自 1988 年以来已经超过美国占据第二位。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具有下述特点:(1) 偏重于非制造业部门。从 1991 年 3 月末到现在(累计)的情况来看,制造业占 25.4%,非制造业占 73.3%。(2) 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业种较多,技术先进型的很少;属于加工组装的业种比较多,零部件生产的业种很少。(3) 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很少。制造业平均每项投资的投资额是 142 万美元。

日本的对华投资与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约 1/4)相比明显落后,而且发展缓慢,中国方面对此感到不满。为了促进日本的对华投资,中日两国政府间以及民众、民间组织间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制定对策。1988 年 8 月,两国政府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1990 年 3 月,中国修改了合资企业法,为了保护外国企业的合法利益,对合资期间以及企业人事等条款进行了补充与修改。同年,中日两国彼此在对方国家设立了投资促进机构,共同召开会议,在事务层面全面开展合作,对促进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现在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变得非常活跃,特别是对上海浦东新区的投资变得非常引人注目。

(三) 融资

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来,中日两国的资金合作关系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除了通常的商业信用的大幅增加以外,日本政府与各种金融机构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融资。这些融资对中国的第六、第七个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的完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政府的日元贷款。自 1979 年开始,日本政府通过海外合作

基金,分三次向中国贷款,总额达 16 144 亿日元。第一次是 1979—1984 年间的 3 304 亿日元,主要用于铁路、港口的建设;第二次是 1984—1990 年间的 4 740 亿日元,主要用于铁路、港口、水电站、通信设施的建设;第三次是竹下登前首相于 1988 年访问中国时承诺的,即在 1990—1995 年间提供 8 000 亿日元贷款。第三次日元贷款被冻结两年后于 1991 年重新启动。现在,第三次日元贷款的换文已经全部完成,正在进入各个项目的具体实施阶段。政府的日元贷款都是低息(年利率 3%左右)、长期(搁置 10 年、分 30 年偿还)的贷款。

(2) 能源贷款。1979 年以来,日本进出口银行分三次为中国提供煤炭与石油资源开发贷款。第一次贷款是 1979 年签约的 4 200 亿日元,第二次贷款是 1984 年签约的 5 800 亿日元,第三次是今年 6 月刚签约的 7 000 亿日元。偿还期限都是 15 年,年利率略高于 6%,低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

(3) “黑字还流”借款。1987 年 10 月,日本政府依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向中国的出口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提供 1 000 亿日元的贷款。

(4) 无偿援助。日本政府在 1981 年至 1991 年 3 月期间,累计向中国无偿提供了 630 亿日元的无偿援助。援助项目超过 50 个,包括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中心以及上海的第六人民医院新楼的医疗设备等。

(5) 其他资金合作。自 1982 年至 1991 年 6 月,在日本政府以及众多银行、证券公司的合作之下,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一部分省市的信托公司在日本的金融市场相继发行了 25 次债券。其中 23 次是以日元为标准换算的债券,总额 4 300 亿日元,2 次是以美元为标准换算的债券,总额达 2.5 亿美元。此后,中国债券得以在日本持续发行。此外,1979 年以来,日本的金融机构多次组成企业联合组织,向中国银行提供企业联合贷款与两国间的贷款。

(四) 技术贸易

1979—1990 年间,中国用中央政府拥有的外汇从日本引入的技

术和设备累计达到 84.6 亿美元。到 1986 年为止,在中国引进的技术中,日本一直处于第一位。但自从 1987 年的“东芝机械事件”以来,两国的技术贸易四年来连续减少,日本已经下降到第六位。面对这样的状况,两国进行了积极努力,至 1991 年,两国间的技术贸易额开始恢复。两国间的技术贸易中,以来自日本的设备进口为主,软技术很少。这可能是日本企业担心会产生“飞回棒”的效果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日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现在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还很少,但中国包括贷款、债券发行等在内的引进外资总额中日本所占的比例一直占据首位。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统计,1984—1990 年间,从中国内地实际引进外资的区域构成来看,日本占 33.3%,遥遥领先于中国香港和澳门的 26% 与美国的 5.4%。

因此,一方面,日本对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对象国。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各种融资、技术合作等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的开发、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的设备更新、新产品的开发、出口的促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对日本而言是重要的商品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这种互补的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在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摩擦,但这大多是由两国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内外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完全不足为奇。重要的是两国要基于长期友好与互助的目标,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拥有光明的前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的扩大、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在经济层面的互补、相互依存程度将会日益加深。因此,位于西太平洋区域的中日两个大国间的经济合作与相互发展,将为这一区域的繁荣与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教授;
原文为日文,由雷玉虹翻译)